

# 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及辛化的陶渊明

王慧刚

(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,河南 新乡 453007)

**摘要:**辛弃疾词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用典,在这些典故的运用中,辛弃疾尤其欣赏陶渊明。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过程,应该说三度罢官隐居的人生经历是其产生慕陶思想的重要现实基础。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认同表现在多方面,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:田园情趣、注重友情、喜爱饮酒。当然,辛弃疾毕竟不同于陶渊明,二人的身份、性格不同,辛是爱国志士,陶则是隐逸名士,二人的理想和思想也不相同,辛弃疾的理想是抗战杀敌、统一祖国,陶渊明则更向往不受束缚的自由;在思想上,陶渊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深,辛弃疾则始终是个积极入世者。因此,陶的归隐多了些主动,而辛的归隐更多的是被迫。辛弃疾对陶的接受和抒写也体现出不同于常人的理解,他不仅看到了陶渊明的悠然和静穆,更体会到了陶渊明的豪放和志向,在他的笔下,塑造了一个“金刚怒目式”的辛化了的陶渊明。

**关键词:**辛弃疾;陶渊明;归隐;接受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6.2/4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7-905(2015)06-0103-07

辛弃疾是两宋词人中现存词作数量最多的词人,也是两宋词史上地位和成就最高的一位词人。辛词在内容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用典,“据粗略统计,一部《稼轩词》,能明确看出用了典故的有569首,占稼轩词总数的90.3%”<sup>[1]</sup>。在典故的运用中,辛弃疾“尤好称渊明”<sup>[2]</sup>。为什么辛弃疾“好称渊明”,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?

## 一、辛弃疾“三仕三已”的人生与陶渊明的接受

作为一个文武双全、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英雄,陶渊明的行为和风格绝对不会是辛弃疾的第一选择,事实上,辛弃疾对陶渊明的仰慕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官场上的尔虞我诈、构陷倾轧是辛弃疾不断产生归隐心理的客观动因,而三度罢官隐居的人生经历则是辛弃疾产生慕陶思想的现实基础。

辛弃疾第一次被罢官是淳熙八年(1181)冬,在此之前,他在南宋朝廷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的游宦生

涯,南宋小朝廷讳言抗战,文恬武嬉,沉湎歌舞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辛弃疾深感孤立无援,在一首《新荷叶》词中写道:“知音弦断,笑渊明、空抚余徽。”借渊明抚琴之事感叹世无知音,他在后来的《淳熙乙亥论盗贼札子》中说:“臣孤危一人久矣……生平刚拙自信,年来不为众人所容。”从“久矣”二字可以看出,这种“孤危”的感觉并非是一时之念。而世人的不容、无所作为的现实使得辛弃疾不禁产生学习“渊明归来”(《西河》)的想法,并开始着手在带湖修建宅第,淳熙八年(1181)秋天,带湖新居将成,辛作《沁园春》词一首表现其复杂的矛盾心态:

三径初成,鹤怨猿惊,稼轩未来。甚云山自许,平生意气;衣冠人笑,抵死尘埃。意倦须还,身闲贵早,岂为莼羹鲈鲙哉。秋江上,看惊弦雁避,骇浪船回。

东冈更葺茅斋。好都把轩窗临水开。要小舟行钓,先应种柳;疏篱护竹,莫碍观梅。秋菊堪餐,春兰可佩,留待先生手自栽。沈吟久,怕君恩未许,此意徘徊。

收稿日期:2015-03-11

基金项目: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(2012-GH-135);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;河南师范大学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

作者简介:王慧刚,男,山西潞城人,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,主要从事唐宋词研究。

徊。

作者虽时任江西安抚使,但官场的排挤与猜忌已使他感到厌倦,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激流勇退,回到乡间去享受闲暇惬意的隐居生活,然而功名未立,一事无成的心理又使他不甘心就此归隐,其“沈吟”“徘徊”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表现,而“君恩未许”不过是他未能忘怀政治的一个借口罢了。

就在辛弃疾犹豫之时,台臣王蔺以“用钱如泥沙,杀人如草芥”(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)等不实之词上本弹劾,结果辛弃疾被罢免了所有职务,从淳熙九年(1182)至绍熙二年(1191)在带湖新居被闲置了10年。闲居初期,辛弃疾为了化解内心的痛苦,决定向渊明学习,学习渊明种菊,“东篱多种菊,待学渊明”(《水调歌头》)。学习渊明种柳,“便此地,结吾庐,待学渊明,更手种、门前五柳”(《洞仙歌》)。更学习渊明饮酒,“倾白酒,绕东篱,只于陶令有心期”(《鹧鸪天》)。但是辛弃疾对仕途并没有彻底死心,对功名事业也还存有浓厚的期望,这从他淳熙十一年(1184)寿韩元吉的一首《水龙吟》就能看出:“算平戎万里,功名本是,真儒事……待他年,整顿乾坤事了,为先生寿。”他虽身在闲居,但还期待着日后东山再起,整顿乾坤,完成复国大业。正因如此,辛弃疾虽表现出学习陶渊明的兴趣,但并不能学到渊明的旷达与悠然,他自己也觉得与渊明“酒兴诗情不相似”(《洞仙歌》),不能忘怀时事,超脱世俗使他感到“我愧渊明久矣”(《水调歌头》)。

总之,这十年的隐居生活,辛弃疾内心充满激烈矛盾和抑郁不平,杨海明先生曾描写其矛盾状态为:“一方面他对自己的遭谗落职心有不甘和心怀不满,另一方面又对能避开官场的倾轧而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和解脱;一方面他赞美隐居生活的安宁和淡泊,另一方面又对光阴的浪掷感到惋惜和痛苦;一方面对政治生活感到了厌倦和畏惧,另一方面却又期望着能重返政治舞台继续发挥其文才武略。”<sup>[1]</sup>正因如此,他这一时期的学陶比较浅显,只是学到了栽菊种柳的表面。

光宗绍熙二年(1191)冬,辛弃疾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,第二年秋,辛又出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,再次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。到任后,勤于政事,忠于职守,由于施政措施以及性格等方面的原因,又招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,辛弃疾也深感危机,想要上表请归,时在绍熙五年(1194),有词为据:

吾衰矣,须富贵何时。富贵是危机。暂忘设醴抽身去,未曾得米弃官归。穆先生,陶县令,是吾

师。待萸个、园儿名“佚老”,更作个、亭儿名“亦好”,闲饮酒,醉吟诗。千年田换八百主,一人口插几张匙。便休休,更说甚,是和非。(《最高楼·吾拟乞归,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,赋以骂之》)

词虽题作骂子,但实是借题发挥,骂尽了迫害他的当权派和追求利禄的俗人,表明了自身因政治失意而打算归隐、求乐于田园的志趣。词中把陶渊明作为自己之师,也说明他对主动归隐的陶渊明在理解上深了一层,如果说第一次退隐被迫性很强的话,这一次则多了一层主动因素。

绍熙五年(1194)秋,谏官黄艾以“残酷贪饕,奸赃狼籍”的罪名弹劾辛弃疾,辛被罢职再次回到江西。由于带湖住宅遭火灾焚毁,故于不久之后举家迁居铅山瓢泉。从宋光宗绍熙六年(1195)至宋宁宗嘉泰二年(1202),开始了八年多的再次隐居生活,经过这两年多的仕途生活,他对南宋朝廷,包括对自身都有了更深的了解,心态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先看一首《沁园春》:

一水西来,千丈晴虹,十里翠屏。喜草堂经岁,重来杜老;斜川好景,不负渊明。老鹤高飞,一枝投宿,长笑蜗牛戴屋行。平章了,待十分佳处,着个茅亭。

青山意气峥嵘。似为我归来妩媚生。解频教花鸟,前歌后舞,更催云水,暮送朝迎。酒圣诗豪,可能无势,我乃而今驾驭卿。清溪上,被山灵却笑,白发归耕。

重回旧居,见到秀美的田园风光,词人不禁流露出欣喜之情,他借用杜甫经乱后重回成都草堂的喜悦,和陶渊明隐居柴桑时对斜川的赞美,来表明自己类似的心情,从中一点儿也看不到被罢官后的失意,说明他与上次被罢免的心态已经不同了,似乎对报国之愿也无所留恋。

在看似达到超脱的状态下,他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总结和反思,如其《行香子》词:

归去来兮。行乐休迟。命由天、富贵何时。百年光景,七十者稀。奈一番愁,一番病,一番衰。

名利奔驰。宠辱惊疑。旧家时,都有些儿。而今老矣,识破机关:算不如闲,不如醉,不如痴。

此词虽然表面上仍唱的是及时行乐的老调,但内心体验却与以前不大相同,他几乎断绝了对功名的欲望,对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遭遇有了新的认识,觉悟到“名利奔驰、宠辱惊疑。旧家时,都有些儿”,即自己也曾参与过争名夺利,有过名利思想,而如今,自己“识破机关”,功名对他来讲已没有任何意

义。陶渊明“觉今是而昨非”的思想也不断涌现,如:“试回头五十九年非,似梦里欢娱觉来悲。”(《哨遍》)“六十三年无限事,从头悔恨难追。已知六十二年非。”(《临江仙》)

这一时期,辛词中有关陶渊明的作品最多,辛弃疾也在更深层次上走近了陶渊明,首先,他肯定了陶渊明的生存态度,“记醉眠陶令,终全至乐;独醒屈子,未免沉灾”(《沁园春》),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”(《水调歌头》)。其次,在学习渊明各种情趣的同时,进而用自己的心灵重新感悟。如辛弃疾认为菊花所象征的凌霜不屈、高洁脱俗的优秀品格是经陶渊明吟咏才得以发扬光大的,说道“自有渊明方有菊”(《浣溪沙》),“须信采菊东篱,高情千载,只有陶彭泽”(《念奴娇》)。辛弃疾此时对陶诗悉心研读,达到了“读渊明诗不能去手”(《鹧鸪天》题序)的程度。总之,“和带湖闲居时期相比,他多了些理智和冷静,少了些冲动和幻想;多了些隐逸闲适的情趣,少了些功名事业的欲念;多了些宠辱不惊的平和心态,少了些悲怆难忍的激愤。”“但是,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,这种不同只是量的变化,程度的差异,并不是质的变化。从本质上看,他的内心深层依然埋藏着等待燃烧的理想火焰。”<sup>[4]</sup>

嘉泰三年(1203),当权的韩侂胄谋划北伐以保个人权势,起用了大批主战人士,辛弃疾也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。辛此时已经64岁,但仍希望在晚年的最后这次机会中再为恢复中原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在改镇江知府任上,辛甚至想再建立一支上万人的劲旅。但事尚未成,他就因荐人不当而降两级,接着又被诬以“好色贪财,淫刑聚敛”的罪名,革去官职,重返铅山瓢泉。

这次“回光返照”式的短暂出山使得辛弃疾彻底绝望了,不过从他的表现来看,其心理倒显得颇为平静,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复国方略不会实现了,虽然此间也会偶尔发出“廉颇老矣,凭谁问,尚能饭否”(《永遇乐》)的豪迈之音,但更多的是趋向于平淡,如其《瑞鹧鸪·京口有怀山中故人》一词:

暮年不赋短长词,和得渊明数首诗。君自不归归甚易,今犹未足足何时?偷闲定向山中老,此意须教鹤辈知。闻道只今秋水上,故人曾榜《北山移》。

此词作于镇江知府任上,从词人“不赋短长词”而“和得渊明数首诗”的行为来看,其原先激荡忧愤的心境已经转向渊明的平淡安闲,而从他的诗来看,的确颇有渊明淡然之风,如《鹤鸣偶作》:“朝阳照屋小窗低,百鸟呼檐起更迟。饭饱且寻三益友:渊明康

节乐天诗。”难有作为的现实使得辛弃疾甚至有些后悔自己的出山行为,因此,三度罢归后的辛弃疾很像当年弃官归来的陶渊明,表现出一种轻松、悠然的状态。在生命的最后时段,辛弃疾对于自己的人生以及社会现实进行了回顾和总结,并通过一首词表现出来:

贤愚相去,算其间能几?差以毫厘谬千里。细思量:义利舜跖之分,孽孽者,等是鸡鸣而起。

味甘终易坏,岁晚还知,君子之交淡若水。一饷聚飞蚊,其响如雷;深自觉、昨非今是。美安乐窝中泰和汤,更剧饮无过,半醺而已。(《洞仙歌·丁卯八月病中作》)

贤愚不分,是非颠倒,这就是他想要施展抱负的现实社会,他不被受容,无法立足也就在所难免了,他庆幸自己从污浊的环境中解脱出来,并再次肯定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昨非今是”的想法。此词作于开禧三年(1207)八月,辛八月染疾,九月卒,这首词是他临终前最后写下的一首“觉醒”之词,也表明了他对陶渊明的最终接受。

## 二、田园情趣、友情、饮酒:辛弃疾闲居生活对陶渊明的认同

从辛弃疾淳熙八年(1181)第一次被罢官算起到宋宁宗开禧三年(1207年)去世,在这25年中,辛弃疾出任官职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5年,也就是说,他有整整20年的时间都闲居在江西农村,在闲居的时光中,辛一步步走近了陶渊明,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和渊明有所相似,把陶渊明引为同道。

首先,辛弃疾和陶渊明一样,注重追求乡村的田园情趣。

二人归来后都对乡村田园的环境表示出喜爱之情,如陶渊明就写过《归园田居》五首,除了田园环境,陶渊明对自己所结之“庐”也非常喜欢,虽然只是“蓬庐”(《答庞参军》:“夕偃蓬庐”)、“弊庐”(《饮酒》:“弊庐交悲风”)、“草庐”(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:“草庐寄穷巷”),但是他却说: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”(《读《山海经》十三首》)

相比陶渊明之田园和庐舍,辛弃疾所居之地就显得非常“豪华”了,淳熙九年(1182),辛落职归居带湖,作《水调歌头》(带湖吾甚爱)一词表示了对带湖风景的喜爱之情。为了表示对陶渊明的仰慕,辛弃疾有意地把自己的宅居称为“陶潜宅”。有趣的是,辛弃疾的“陶潜宅”与陶渊明的宅庐都遇到了火灾,火灾之后,陶渊明寄身于破舟之上,生活凄惨,“一宅无遗宇,舫舟荫门前”(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),辛弃

疾也是“借车载家具,家具少于车”(《水调歌头》)。但好在铅山瓢泉新居已经建成,辛弃疾对新居依然十分喜爱,在词中借用陶渊明原诗也说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”(《水调歌头·我亦卜居者》)。有时他把瓢泉新居直称为“陶令宅”(如《满江红》:“种柳已成陶令宅”),还修有一座“停云堂”,辟有一条“停云竹径”,取自渊明《停云》诗。因为“渊明最爱菊,三径亦栽松”(《水调歌头》),所以又修了一座松菊堂,也多栽松菊,所谓“吾亦爱吾庐,多松菊”(《满江红》)。“吾庐”一词在辛词中出现达13次之多,不能不说是受到渊明的影响所致。

辛弃疾之所以喜爱田园家居生活,主要是因为他感受到了陶渊明诗中所写“复得返自然”的乐趣。他可以在此享受闲暇无事的悠然之意。辛弃疾非常喜欢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(《饮酒》)一句所表现出来的意境,他的友人傅岩叟有一阁名“悠然”,他便多次作词题赠,如《新荷叶·再题悠然阁》:

种豆南山,零落一顷为萁。岁晚渊明,也吟草盛苗稀。风流划地,向尊前、采菊题诗。悠然忽见,此山正绕东篱。千载襟期。高情想像当时。小阁横空,朝来翠扑人衣。是中真趣,问骋怀、游目谁知。无心出岫,白云一片孤飞。

回到乡村田园,自然少不了稼穡耕作的体验。陶渊明选择了亲事劳作的人生道路,无所怨言,“遥遥沮溺心,千载乃相关。但愿长如此,躬耕非所叹”(《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》)。辛弃疾罢官归来后也受陶渊明的影响,他初次闲居带湖,便自号“稼轩”,他的几个儿子,也都以“禾”旁字取名。他曾说“人生在勤,当以力田为先”(《宋史本传》)。还作词表示要“植杖且耘耔”(《水调歌头》)(按:化用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怀良辰以孤往,或植杖而耘耔”)。

陶渊明的田园诗,多写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平凡景物,着重表现身处其中的生活情趣,如《和郭主簿》其一:

蔼蔼堂前林,中夏贮清阴。凯风因时来,回飏开我襟。息交游闲业,卧起弄书琴。园蔬有余滋,旧谷犹储今。营已良有极,过足非所钦。春秫作美酒,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戏我侧,学语未成音。此事真复乐,聊用忘华簪。

在辛弃疾词中,很多描写闲居生活的词也颇具陶诗的风味,如《行香子·山居客至》:

白露园蔬,碧水溪鱼,笑先生钓罢还锄。小窗高卧,风展残书。看《北山移》、《盘谷序》、《辋川图》。白饭青刍,赤脚长须。客来时,酒尽重沽。听风听

雨,吾爱吾庐。笑本无心,刚自瘦,此君疏。

从表现内容来看,此词与渊明诗非常相像,都写乡村的风光、闲居的适意、饮酒读书的乐趣。这类词还有很多,不再例举。总之,在闲居的生活中,辛弃疾有意模仿、追求陶诗的田园境界,以此来化解政治上的失意情绪。

其次,辛弃疾除了追求田园情趣之外,还非常注重友情。

这从他词中多次运用陶诗中的“停云”意象就可看出。渊明《停云》(霏霏停云)诗前有序曰:“停云,思亲友也。”从诗中“良朋悠邈,搔首延伫”“安得促席,说彼平生”“岂无他人,念子实多”可以看出,渊明是一个笃于友情的人。除了《停云》,我们还能从《答庞参军》《和郭主簿》等诗中了解他对朋友的浓厚情谊,如“我有旨酒,与汝乐之。乃陈好言,乃著新诗。一日不见,如何不思”(《答庞参军》)。

辛词中,除《声声慢》(停云霏霏)全词隐括《停云》诗外,另有11首词涉及“停云”。在这11首词作中,“停云”一词虽大部分都指的是“停云堂”,但“停云堂”之名本身就取自陶诗思亲友之意,因此,“停云”的使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了辛弃疾的思友之情,如《贺新郎》(甚矣吾衰矣)一词,词序明确说明:“邑中园亭,仆皆为赋此词。一日,独坐停云,水声山色,竞来相娱,意溪山欲援例者,遂作数语,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。”

再如一首《婆罗门引·用韵别郭逢道》:

绿阴啼鸟,阳关未彻早催归。歌珠凄断累累。回首海山何处,千里共襟期。叹高山流水,弦断堪悲。中心怅而,似风雨、落花知。更拟停云君去,细和陶诗。见君何日,待琼林、宴罢醉归时。人争看、宝马来思。

在这首送别词中,主要突出的就是别后之思,“停云”同样是兼有堂名,但更具“思友”之意。

使用“停云”意象只是表现辛弃疾重视友情的一个方面,辛弃疾交友相对比渊明要广泛,但是他有一定的原则,那就是注重志同道合,这同渊明也是一样的,比如词中常见到的陈亮、傅岩叟等。试举一首名作《贺新郎》:

把酒长亭说。看渊明、风流酷似,卧龙诸葛。何处飞来林间鹊,大步蹒跚松梢残雪。要破帽、多添华发。剩水残山无态度,被疏梅、料理成风月。两三雁,也萧瑟。佳人重约还轻别,怅清江、天寒不渡,水深冰合。路断车轮生四角,此地行人销骨。问谁使、君来愁绝?铸就而今相思错,料当初、费尽其人间

铁。长夜笛，莫吹裂。

词前有较长的序：“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，留十日，与之同游鹅湖，且会朱晦庵于紫溪，不至，飘然东归。既别之明日，余意中殊恋恋，复欲追路，至鹭鸶林，则雪深泥滑，不得前矣。独饮方村，怅然久之，颇恨挽留之不遂也。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，闻邻笛悲甚，为赋《乳燕飞》以见意。又五日，同父书来索词，心所同然者如此，可发千里一笑。”

陈同父即陈亮(1143—1194)，南宋杰出的思想家。为人才气豪迈，喜谈兵，主抗战，因此屡遭迫害，曾三次被诬入狱。与稼轩志同道合，交往甚密。这首词是辛追忆与陈亮的交会以及抒写别情的作品，仅从序文就可看出辛是如何的笃于友情，而词作本身更是句句出自肺腑，情感真挚。俞陛云先生评曰：“稼轩与同甫，为并世健者，交谊之深厚，文章之振奇，可称词坛瑜、亮。”<sup>[5]</sup>

辛陶二人都重友情，都追求志同道合，但也有不同，陶之于友，更偏向于生活情趣方面：“有客赏我趣，每每顾林园。谈谐无俗调，所说圣人篇。”(《答庞参军》)“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赋新诗。过门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”(《移居》之二)而稼轩却多注重政治上的追求，如上述陈亮，但这样的朋友毕竟不多，所以辛常感叹“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，不见吾狂耳。知我者，二三子”(《贺新郎》)。知音稀少加重了辛弃疾英雄失路的孤独感。

再次，来谈一下“饮酒”。

陶渊明自称“性嗜酒”(《五柳先生传》)，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说“陶渊明之诗，篇篇有酒”。辛弃疾则说自己“身世酒杯中”(《浪淘沙》)。据统计，“辛稼轩《稼轩词》共六百二十九首，其中专写饮酒、写到饮酒和借酒态拟物态的词竟有三百四十七首，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。这么高的数字和百分比，在两宋词人中可谓第一人”<sup>[6]</sup>。在辛弃疾的“酒词世界”里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借酒而发的“醉舞狂歌”，如：

未应两手无用，要把蟹螯杯，说剑论诗余事，醉舞狂歌欲倒，老子颇堪哀。(《水调歌头》)

狂歌击碎村醪盏，欲舞还怜衫袖短。

(《玉楼春》)

“渊明酒”对辛弃疾的影响自然不在这方面，陶渊明更注重的是饮酒后的超然、旷达与适意，辛的饮酒词也体现了这一点：

倾白酒，绕东篱。只于陶令有心期。

(《鹧鸪天》(戏马台前))

爱酒陶元亮，无酒正徘徊。

(《水调歌头》(千古老蟾口))

记醉眠陶令，终全至乐；独醒屈子，未免沉灾。

(《沁园春》(杯汝知乎))

在辛弃疾的心中，陶渊明不但爱酒，懂得酒中的乐趣，还是一位因酒而全身避祸的智者，这是辛自叹弗如，并向往与“陶令有心期”的重要原因。

辛弃疾酒量惊人，《定风波》云：“少日春怀似酒浓，插花走马醉千钟。”《卜算子》：“一饮动连宵，一醉长三日。”但饮酒过量“虽可忘忧，然能作疾”<sup>[7]</sup>。辛也有饮酒与养生的矛盾，如《最高楼》词中说：“待不饮，奈何君有恨；待痛饮，奈何吾又病。”在庆元二年移居瓢泉至庆元三年一段时间内，辛弃疾果然因酒成病，也因病而止酒，写了很多止酒词：

知翁止酒，待重教、莲社人沽。(《汉宫春》)

谁知止酒停云老，独立斜阳数过鸿。(《鹧鸪天》)

这些词也体现了渊明《止酒》诗的影响，从辛自己作的《止酒》诗就可看出：“渊明爱酒得之天，岁晚还吟止酒篇。日醉得非促龄具，只今病渴已三年。”

总的来说，“饮酒”是辛弃疾与陶渊明结缘的一个重要方式，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，辛弃疾并没有像渊明一样，真正体会到酒中的深味与真趣，他自己也说：“饮酒已输陶靖节。”(《读邵尧夫诗》)“这‘输’的并非是酒‘量’，而是酒‘境’、酒‘味’、酒‘趣’。”<sup>[8]</sup>

### 三、辛弃疾与陶渊明的差异及辛化的陶渊明

辛弃疾在近二十年的闲居生活中很多方面对陶渊明表现出认同，但他们的不同点也是很明显的。比如辛弃疾追慕陶渊明的现实基础是归隐，但在归隐方式上二人就不一样，陶渊明是主动归隐，当他看到官场的黑暗与污浊，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在当时的社会有所作为时，就毅然辞官归去。而辛弃疾则虽然也看到当时社会的混乱不堪，知道自己的复国大业不能实现，并且在他的词作中反复申明归来之意，但始终不能主动解职隐退，结果遭弹劾诬陷被迫赋闲。

在归来后，二人的心态也不尽相同，简单来讲，陶渊明不以功名念，归来后心无所待，而辛弃疾心中始终不能摆脱功名观念，心有所待。

对于渊明来说，出仕做官本就是因为家贫、寒饥，“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……亲故多劝余为长吏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，“畴昔苦长饥，投耒去学仕”(《饮酒》)，“少而穷苦，每以家弊，东西游走”(《与子俨等疏》)，虽然也曾有过做出一番事业，或者经世济民的想法，也有过“有志不获聘”(《杂诗十二首》)的怨悲，但“瞻望邈难逮，转欲志长勤”(《癸卯岁始春怀

古田舍》),一看到无法实现,便走向了独善其身的道路,“固穷夙所归”(《有会而作》),对功名事业不再挂怀,甘心过自由而贫苦的生活,心境淡然。

辛弃疾走上仕途的最大目标是为实现自己抗战复国的统一大业,他有过人的才华,希望“挽银河仙浪,西北洗胡沙”(《水调歌头》),“诗书万卷,致身须到古伊周”(《水龙吟》),“袖里珍奇光五色,他年要补天西北”(《满江红》),“马革裹尸当自誓”(《满江红》)。因此当他被迫归隐后,并不甘心过平淡的生活,而是期待重新复出,为国效力。闲居时的主情绪是悲愤和苦闷,“笑吾庐,门掩草,径封苔。未应两手无用,要把蟹螯杯”(《水调歌头》),“短灯檠,长剑铁,欲生苔。雕弓挂壁无用,照影落清杯”(《水调歌头》),“人散后,月明时,试弹《幽愤》泪空垂”(《鹧鸪天》)。闲居对辛弃疾来说,不是享受,而是年华逝去、志不得伸的折磨,他做不到如陶渊明一样“白日掩荆扉,虚室绝尘想”(《归园田居》)的闲淡。

这种心态的外现就是渊明之诗表现得恬淡、宁静,而辛弃疾词则显得灵动、跳跃。用王国维先生的理论来讲就是,陶渊明多是“无我之境”,辛弃疾则多是“有我之境”。王国维先生曾举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一句为“无我之境”的代表。下面试举一首辛弃疾的“有我之境”的作品《沁园春·灵山齐庵赋,时筑偃湖未成》:

叠嶂西驰,万马回旋,众山欲东。正惊湍直下,跳珠倒溅,小桥横截,缺月初弓。老合投闲,天教多事,检教长身十万松。吾庐小,在龙蛇影外,风雨声中。

争先见面重重。看爽气,朝来三数峰。似谢家子弟,衣冠磊落;相如庭户,车骑雍容。我觉其间,雄深雅健,如对文章太史公。新堤路,问偃湖何日,烟水蒙蒙?

词作于庆元二年(1196)辛罢居带湖之时,是辛弃疾非常精彩的山水词之一,以写山为主,复点染以水,把灵山风景写得形神兼备,而其中又贯注了词人强烈的主观色彩,比如词人一起笔,就化静为动,把绵延起伏的山峰比作万马奔驰之状,写得气势飞腾,其后又“或喻为谢安子弟,或喻为相如车骑,或喻为马迁文章……这种连用人物、车骑、文章等各类不同的人和物来比喻山势山容,又采取铺陈排比的手法……在词中却是极其罕见的”<sup>[9]</sup>。作者把自己的胸襟气度,包括悲愤全都倾注于笔下的物象,因此,从山水风景的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他投闲居家的苦闷情怀。

产生如此不同的原因,从身份、性格来讲,陶渊

明只是一位诗人,出身于已经没落的仕宦家庭,他所处的东晋王朝偏安近五十年,统一恢复早已无望。而且陶自言“闲静少言,不慕荣利”(《五柳先生传》),对事功的追求并不强烈,当他对现实不满时,不是努力抗争而是主动避退,“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”(《归园田居》),他更多的是追求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完善。辛弃疾却是一位英雄豪杰,并且表现出“浓厚的军人意识”<sup>[10]</sup>,他出生时,靖康之变仅仅过去13年,抗战复国的情绪充斥着南北大地。辛父早逝,祖父辛赞把抗金希望寄托在他身上,他是带着“都洗尽髭胡膏血”(《满江红》)的心愿来到南宋朝廷的,追求事功、复国统一是他终生的目标。

从思想影响方面看,陶渊明受道家影响很深,对功名、生死看得很淡,如其诗中说“千秋万岁后,谁知荣与辱”(《拟挽歌辞》),“人生如幻化,终当归空无”(《归园田居诗》)等,就儒家影响来看,也更多的是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思想。辛虽然也出入于三教思想,曾说“案上数编书,非庄即老”(《感皇恩·读庄子有所思》),但由于强烈的事功心态,他似乎无意于对生死、天人关系等作形而上的思考,而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此岸世界。所以在他的眼中,庄子也并未完全超脱,“君看庄生达者,犹对山林皋壤,哀乐未忘怀”(《水调歌头》)。

总之,政治忧愤是辛弃疾闲居的主要情感,他努力向渊明学习,“我愧渊明久矣,犹借此翁湔洗,素壁写《归来》”(《水调歌头》)。希望借渊明归田的抒写抚慰内心的创伤,平息内心的苦闷,但他却做不到渊明的淡泊,尽管他对陶渊明任真、自然的人生道路表示钦慕和肯定,他也“努力追求、竭力标榜的是闲适,而他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、无处不在的是愤悲,是‘峥嵘’”<sup>[8]</sup>。辛弃疾始终是一个积极入世者,这也是他与陶渊明最大的不同。

正因为此,辛弃疾笔下的陶渊明并非是简单的“隐逸诗人之宗”形象,他在对陶渊明的咏写中加入了自己的影子。换句话说讲,他不仅看到了渊明的悠然和静穆,更体会到了渊明的豪放和志向。

具体来讲,辛弃疾常将陶渊明与另一位他崇拜的历史人物诸葛亮相提并论。如“把酒长亭说,看渊明风流酷似,卧龙诸葛”(《贺新郎》),“往日曾论,渊明似胜卧龙些”(《玉蝴蝶》)。

陶渊明和诸葛亮,除了都曾躬耕陇亩外,在思想性格和勋业成就上并没有可比之处,辛弃疾却创造性地将二者放在一起,这当然是有着一定含义的。

关于渊明的精神,本就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,即

陶渊明的性格中包含着平淡与豪放两种看来并不相同的气质。辛弃疾欣赏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,更赞赏被人久已遗忘的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的志气,他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,激起了情感的共鸣。

《贺新郎》(把酒长亭说)一词本为赠送陈亮之词,以诸葛、陶二人比拟陈亮,实际也是自比,其意在于表明,二人虽然现在都像渊明一样守拙闲居,但只要有机会出山,就一定会像诸葛亮那样成就一番事业。而陶渊明之所以没有成就功业,就在于他没有得到像诸葛亮那样的机会。辛弃疾在另一首《贺新郎》中就感叹说:“到君家、悠然细说,渊明重九。岁晚凄其无诸葛,惟有黄花入手。”辛弃疾将隐居作为诸葛与陶相似的基础,又将陶的志向与豪气加以扩展,使之与诸葛亮有了相互比照的可能性。

最早以诸葛亮比陶的大概是黄庭坚,他作诗道:“潜鱼愿深渺,渊明无由逃。彭泽当此时,沉冥一世豪。司马寒如灰,礼乐卯金刀。岁晚以字行,更始号元亮。凄其望诸葛,肮脏犹汉相。”<sup>[11]</sup>关于这一点,宋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已指出“此则承《南史》之误耳”,“其实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,在宋则更名潜,而仍其旧字”<sup>[12]</sup>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陶的刻意解读。

一直以来,人们更多的是推重陶渊明的闲适与恬淡,特别是经过苏轼的“苏化”之后,陶渊明“金刚怒目式”的一面被有意回避或淡化了,“陶渊明的主要精神是归向自然,是个体与自然的谐和混一,以求得心灵的自由和恒久”<sup>[13]</sup>。然而辛弃疾却重新诠释引申出另一个陶渊明,一个诸葛亮式的陶渊明,在此认识的基础上,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“高情”,认为“高情千载,只有陶彭泽”(《念奴娇》),“千载襟期,高情想像当时”(《新荷叶》),看重陶渊明的“生气”“爽气”,“须信此翁未死,到如今凛然生气”(《水调歌头》),“万事纷纷一笑中,渊明把菊对秋风。细看爽气今犹在,惟有南山一似翁”(《鹧鸪天》),而其中的内涵大概“应当是指陶渊明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和躬耕陇亩、不忘世情的积极精神”<sup>[4]</sup>。

辛弃疾学陶本从陶渊明的闲适入手,他也努力

想达到陶渊明“任真自得”的思想境界,然而却在一步步接受的过程中,发现了陶渊明的豪放,和苏轼学陶一样,“苏辛师陶,实在是各师所师,站在他们各自面前的,是被仙化了的高士和辛老子式的节士、豪士”<sup>[13]</sup>。

清龚自珍《舟中读陶诗三首》说:“陶潜诗喜说荆轲,想见《停云》发浩歌。吟到恩愁心事涌,江湖侠骨恐无多。”“陶潜酷似卧龙豪,万古浔阳松菊高。莫信诗人竟平淡,二分《梁甫》一分骚。”<sup>[14]</sup>大约就是受辛化了了的陶渊明影响所致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张岳伦.从辛词事典统计看辛弃疾塑造的自我形象[J].中国韵文学刊,2007,(2):40—44.
- [2]金启华,等.唐宋词集序跋汇编[C].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0.
- [3]杨海明.唐宋词与人生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2.
- [4]张廷杰.宋词艺术论[M].北京:研究出版社,2002.
- [5]俞陛云.唐五代两宋词选释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
- [6]刘扬忠.稼轩词与酒[J].文学评论,1992,(1):106—114.
- [7][宋]朱翼中.北山酒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1.
- [8]赵晓岚.二分梁甫一分骚——辛弃疾认同陶渊明的辨析[J].学海,2003,(4):185—162.
- [9]常国武.辛稼轩词集导读[M].成都:巴蜀书社,1988.
- [10]刘扬忠.辛弃疾词心探微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0.
- [11][宋]任渊,等注,刘尚荣校点.黄庭坚诗集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.
- [12][宋]王质,等撰,许逸民校辑.陶渊明年谱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13]王水照.王水照自选集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0.
- [14]北京大学中文系.陶渊明资料汇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责任编辑 宋淑芳

(E-mail:hnskssf@163.com)